

# 香山商人的投机传统

黎志刚

## 一、引言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毗邻港澳，交通便利。汉朝时属于番禺县，晋以后又划为东官郡，隋朝时改划为宝安县，唐代以后为东莞县地。由于香山沿海一带地区渔、盐、矿业日益兴旺，人口骤增，到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香山县（因境内五桂山出产沉香而得名），隶属于广州府管辖。<sup>①</sup>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香山县因纪念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之贡献，改名中山县。<sup>②</sup>

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香山县商人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19世纪70年代，流寓上海的香山商人对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初，一群在澳大利亚侨居的香山商人在香港、上海及广州等地创办

---

① 暴煜修，李卓揆辑：《香山县志》（乾隆十五年刊刻）卷1《疆域》，收入吴相湘编：《中山文献》（以下简称《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册，第63—67页；何大章：《新志初稿》，《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印，1947年6月），第2页。又参考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何大章：《新志初稿》第1页；简冠筹主编：《中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中山市《中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编委会，1986年），第19—20页。



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香山商人也兴办保险、银号、银行、纺织及其他新式企业，是一个很有开创性的商人群体。本文主要参考历代刊行的《香山县志》、《香山乡土志》、《申报》、《中山文史》、广肇公所档案、新南威尔斯州中华商会档案、香山县商人的文集及回忆录和近人研究香山县的成果，来探讨香山县商人为何能成为一群具有冒险勇进、独具创新的现代企业家。本文主要想引出的问题是香山商人是不是有一个投机传统？若有的话，这一传统对不同地区的香山商人及中国工、商、交通企业的发展有何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本文所称的投机传统不是指负面的不法行为，而是指具有勇于承担市场风险的近代企业家作风。近代市场是不断变化的，企业的开拓者需要灵活反应，抓紧机会，对市场风险有所洞察，才能在商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近代香山商人在近代企业的卓越表现与其投机传统有关。下面各节将就地理环境、群体性格、香山商人的经营手法和移民模式来分析香山商人的进取精神和投机传统。本文同时也讨论香山商人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如何就降低风险作出一些安排，探讨这些经验如何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 二、地理环境、进取精神与投机传统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为东、西、北三江出口之处，“四面环海”，界连新安、东莞、新会、顺德、新宁（台山）和番禺六县。<sup>①</sup> 境内山环水抱，河道网织，岛屿罗列。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东莞县香山（当时香山隶属东莞县管治）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sup>②</sup> 这种在当时人心目中属于神仙出没馨香馥郁的“仙境”一说虽有不尽信之处，但“地濒海洋”的地理环境确实会增强居民的冒险精神，使他们向往对外发展的神秘性。道光

<sup>①</sup> 田明曜主修，陈澧等纂：《重修香山县志》（光绪五年刊刻），卷3，第1页，《县境图说》，收入《文献》，第5册，第59页。

<sup>②</sup> 何大章：《新志初稿》，第2—3；《香山县乡土志》（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依据珍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手抄孤本重印，1988年），卷1，第3页。

《香山县志》序中指出：“广州濒海县七，而香山独斗出海中，勃郁灵淑之气，与南溟奇甸争雄，宜其代有伟人，节义、文章、科名、仕宦駸駸日盛，且户口殷繁，驾出他邑，而上洵广属之沃土奥区也。”<sup>①</sup> 香山地区独特的海洋环境与其地区的投机传统有关。

香山县辖地原是珠江三角洲出口零丁洋上的岛屿，该县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以前都不存在。《永乐大典》中说：“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sup>②</sup> 上述引文反映当时香山的广大地区并未与大陆连成一片。由于珠江水带来大量冲积土，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广阔的香山冲积平原。这些新增土地若加上人工的围垦，便形成所说的“沙田”。<sup>③</sup> 沙田之开拓也会增强香山居民的冒险性格。香山黄阁地区的开拓即为一例。根据《小榄麦氏族谱》记载：“自宋南渡后，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而必达祖遂至黄阁，甫抵其境，见西沙高峙，石门迴开，溪深悬泻，土沃泉甘，谓此诚避地，遂相彼隰，筑室而居。”他们并“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开始对黄阁地区沙田的垦殖。<sup>④</sup> 在明代时，“海滨沙田日增”<sup>⑤</sup>。这种开发沙田的艰苦创业事例在香山各族族谱中屡见不鲜。

香山很多地区在清代之前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系列小岛屿群。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的《香山县志》及道光七年（1827）刊刻的《新修香山县志》所载，香山县很多地区依然屹立于海涛之中。到清末，香山的土地还是不断地扩展。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粤省沙田，以广州府属香山为最多。”<sup>⑥</sup> 由表一可以看出，香山县从雍正时期（1723—1735）到民

① 祝淮主修，黄培芳等辑：《新修香山县志》（道光七年刊刻），卷首，第2页，收入《文献》，第3册，第3页。

② 《永乐大典》，卷11907，广字，《风俗形势》，转引自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③ 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5页。

④ 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14页。

⑤ 《香山县乡土志》，卷2，第4页。

⑥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50页，光绪十二年八月丙戌张之洞奏；彭雨新编：《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3—604页。



国初年（1926—1932）土地增长三倍。根据叶显恩的估计，香山县沙田有1973345亩，占该县土地十分之九。<sup>①</sup> 这些新增沙田的开拓具有很大挑战性。修筑堤围和与江海争地的经济活动促使香山居民在生存斗争中与大自然搏斗，促成其勇于冒险犯难的民风。除生态及地理环境之外，地区的特殊化也促成香山人的进取精神。

香山地区天灾人祸特别多，史书中常有该县水灾、旱灾、风灾、地震、虫灾及饥荒的记录。<sup>②</sup> 人祸更是屡见不鲜，“海禁”和“海盗”对香山地区的影响最大。

清代初叶，海禁非常严厉，有“片帆不许入口”的政策。由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占领台湾，清政府下令“迁界”。山东至广东沿海各地居民皆要内迁。“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又勒令广东所属的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五十里，并将所有附近海岛洲港（澳门除外）皆向内迁，界内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尽毁。商民皆禁止出海，而出界者立斩。<sup>③</sup> 由于香山县处于滨海地带，当清初施行海禁时，香山被列入内迁的范围。居民在应付上述海禁令时，要对新迁环境重新适应。海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废除，原有居民乃面临重建家园的新挑战。

香山是一海盗活跃的地区。《香山县志》、《香山乡土志》及《申报》常有海寇大盗及走私的记载。<sup>④</sup> 例如道光《香山县志》记载：“案澳南、澳东诸岛皆舶藪，渔船多集此。明初海患多，蜑户为梗，故籍而用之。嘉庆间，鲸窟纵

<sup>①</sup> 叶显恩：《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0页。

<sup>②</sup> 李尧水：《中山市自然灾害史料》，《中山文史》（1986年），第38—54页。

<sup>③</sup> 徐德志、黄达璋、梁郁荣、成有江编：《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91页；刘森：《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178页；郑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267—268页；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潘蔚：《清初广东迁海与广东人民反迁海斗争》，《华南师院学报》，1956年第1期。

<sup>④</sup> 厉式金主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1923年），卷6，第1页，收入《文献》，第7册，第2232页；《新修香山县志》（道光七年），卷4，第61页，收入《文献》，第3册，第620页；《申报》，1879年8月1日；《申报》，1901年5月3日。

横，半为渔户，而屡与之抗，能稍折其锋者，亦惟渔户。其为盗也，有所迫也。衽席风涛，所得者不足以供汛兵巡丁之索取，故生计日绌，强者即愤而为盗。”<sup>①</sup>《香山乡土志》中载有大量海盗的记载。海盗的规模从明代的“四百余”增长到清代的“千余艘”。<sup>②</sup>报章上也曾以香山地区的海盗事件作为第一版主要新闻。1901年5月的《申报》转载《广东商务报》有关盗贼为了区区四百金杀害香山县龙住环乡刘家九命的详细报道，可见该地区海盗活动之严重。<sup>③</sup>民国十二年所刊刻的《香山县志续编》对海盗成因有如下解释：“梟匪滋蔓日深，海旁桀黠之徒，啸聚成群，视为故常，有业者坐地分肥，无业者铤而走险。”<sup>④</sup>海盗和海禁促使香山人很早就冒险出洋谋生。

香山县境南部的澳门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葡萄牙人所侵占。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中西往来的重要通道。不单外来夷商在澳门屯积货物，外来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教士）也在这里落脚。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澳门成为—重要国际贸易港。邓开颂及陆晓敏认为，澳门在国际贸易的地位比广州、长崎、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更为重要。当时澳门的国际航线有五条，分别是（一）广州—澳门—印度—欧洲航线；（二）广州—澳门—日本长崎航线；（三）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四）澳门—大小选他群岛航线；（五）澳门—欧美航线。<sup>⑤</sup>由于澳门乃在香山境内，澳门的发展对香山经济有一定助力。到清代澳门仍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主要桥梁，<sup>⑥</sup>为香山人提供很

① 《新修香山县志》（道光七年），卷4，第78页，收入《文献》，第3册，第653页。

② 《香山乡土志》，卷3，第5页、第7页。

③ 《申报》，1901年5月3日。穆黛安（Dian Murray）的著作中也有一些记载香山地区海盗活跃的情况。见 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 - 181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7 - 69; 126。

④ 《香山县志续编》，卷6，第2页，收入《文献》，第7册，第2233页。

⑤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2页。

⑥ 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年）》（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邓开颂、黄启臣：《港史资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多就业机会。

香山县地区由于地位特殊，走私活动甚为活跃，包括鸦片贸易、私盐、私硝、私矿、火药、洋枪及贩卖人口等活动。<sup>①</sup> 一个原因是澳门地位的特殊化，助长了走私活动。张之洞对这一现象观察得很清楚，他在《奏请妥议缓定葡约疏》中指出：“粤人侨寓澳门者，何止数万，往往两地置产，两地行商，无从限数，至于商民盗匪，往来如织，尤无纪极，西例凡生长于某国之地即可隶籍为某国之民，领取票据，恃为护身符，遇有犯事，地方官不能以华法治之。”<sup>②</sup> 这地位特殊化在《香山县志续编》中也有记载：“奸民嗜利，举凡触网犯禁之事，见移之澳，而官遂无如何也。于是咸恃澳为逋逃藪，日轻官而敢于藐法。举凡奸淫邪盗之事，悉萃于澳。”<sup>③</sup>

从地理及生态环境来看，香山地区确有其独特的海洋性格。套用穆黛安 (Dian Murray) 从生态及经济角度来看广东地区的海洋世界，<sup>④</sup> 香山地区面对海洋的地理特点会培养出一些勇于承担企业风险和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下面各节将会引申这一看法。此外香山地区因靠近港澳，不单交通便利，而且在特殊的历史及国际环境下，可使香山居民在从事冒险活动时多了一道护身符，这对香山商民的投机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表 1 明清香山县土地与人口增长情况

年代	雍正 (1723—1735 年)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	民国 (15—21 年) 1926—1932
土地	707535	1253758	2170679
人口	15488	429215	822180
人均土地 (亩)	45.7	2.91	2.6

资料来源：叶显恩：《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收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0页。

① 《香山县志续编》，卷6，第4页，收入《文献》，第7册，第2238页；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第115—140页。

② 《香山县志续编》，卷6，第12—13页，收入《文献》，第7册，第2254—2255页。

③ 《香山县志续编》，卷6，第4页，收入《文献》，第7册，第2238页。

④ Dian H. Murray, “The Cantonese Water World: Its Ecology an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ISSP,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May 1—3, 1997.

### 三、族体性格

在中国近代史上，香山县人才鼎盛。吴相湘指出：“中国近代第一位赴欧洲（意大利）习神学的郑玛诺（字帷信，1635—1673），第一位赴欧洲（英国）习医学的黄宽（1879年歿），第一位赴美国留学的容闳，都是香山县人。”<sup>①</sup> 早期官派留美幼童中大部分也是来自香山县的。<sup>②</sup> 由于中外接触的利便，开阔该地区居民之视野，增强他们办事的信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洋货涌至。香山县接近港澳，得风气之先，很多人从事商业活动，具有冒险精神。本节将讨论香山人的族体性格。

由于地缘关系，在香山县前山及唐家湾地区一带的香山人多有与外人接触的机会，具有办事的灵活性。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地区培养了一批熟悉洋务<sup>③</sup>和善于营利的买办和赌商。香山人也产生不少热心政治活动和勇于冒险犯难的出国姑婆（自梳女）。香山人似有冒险进取的族群性。

上海《申报》于1874年1月14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一段《广东同人公致申报馆书》与《该馆复广东同人书》。这是针对当时杨月楼一案的广东读者来函，可代表当时留寓上海的广东人对香山人群体性格的看法。下面引函中称：

愚等不幸而为粤人，近因杨月楼一案，先生统谓之曰粤人。……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已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扬扬（洋洋）得意以为光荣，实甚他县，间或

<sup>①</sup> 吴相湘：《中山文献序》，收入《文献》，第1册，第1页。又见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22页。

<sup>②</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3页。留美幼童名单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年重印），第33—34页；《申报》，1873年5月27日；《申报》，1874年8月6日；《申报》，1875年10月2日。

<sup>③</sup> 《香山县志续编》，卷11，第19—40页，《列传》，收入《文献》，第7册，第2387—2433页。

有而同乡，不以为齿，故虽实为此事而亦不敢竟居其名，见人必自讳其所为，求免不齿，于乡里亦然。粤省无此种人之州县亦甚多，并非粤人尽属无耻不堪之辈也。……昔人有上书求削门生籍者，愚等又不能上书求削粤人籍，实属进退维谷，无法求全也，奈何！奈何！先生可否此后若论此案，直斥之曰糠摆渡，或曰细崽，或曰韦（闹）党，或曰党于韦（闹）姓者，祈莫统谓之曰粤人，是则愚等所祷祀以求者耳。……夫人而曰糠，言其轻而且贱也，曰摆渡其小而不稳也，曰买办言其贱，同衙署众人下役也，崽本渺小而加之以细，甚言其微贱也。顾名思义，先生可知伊等之品行矣，至于妇女更不待言矣。……糠摆渡等之最可痛恶者，赚足洋人银钱，便自命为绅富，诚如伊等自供，平者所作所为，肆无顾忌，忘却本来面目，究竟伊等知何道理，明何律例。<sup>①</sup>

五天之后有赴粤宦客投稿于《申报》，文中对香山买办有如下描述：

遂阅广东同人公启，求削“粤人”两字，实属能知气节，非香山无耻之可比。……论区贵贱别尊卑，同省不为无见，惟既已羞与为伍，该县民之品行自可不言而喻矣。名为同隶一省，实则各判两途，乃香山既多寡廉鲜耻之人，而城中亦不乏贤士大夫之辈，乡间何与焉。即以一县而论，×于该属管辖之澳门一带乡间，尤为甚僻壤穷乡蓬门圭窦所生之地，且强且悍，所习之业至贱至微，彼买办细崽辈，大都澳门乡人，十之居九即此洋奴，端岂非明证歇。设或偶有财势，圆其顶而方其靴，诩诩然自鸣得意，早忘却本人之面目矣。何则盖捐纳之职衡，皆以茶×换×，迨一经上兑之后，每自命为有官无印之人，虚张声势，专事招摇，则恐吓乡愚之心申此起矣，伤风败俗至于此极，但更有可笑者，试为约略陈之。香山既为细微之役，往往不知不识者多设。遇见文人学士，自当退避三舍，不料否否周旋晋接，酬酢往还，在弱者自知粗×卤莽，每以缄默不宣，在强者自仗居心狡狴，出言吐语未免肆无忌惮。×念书人为儿戏，或比鬼域，或譬畜类，而于已幸获一枝之栖，不遣旁若无人，抑且似百官之升任者。推其心

<sup>①</sup> 《申报》1874年1月14日。

无非意存妒忌，不肯甘居人下，揆情度理而欲（为）洋奴。（之）列宁其可得乎。此端木子所谓多见其不自量也，吾故曰乡愿德之贼也，可于此案在事之人赠之，谓为香山县民之流业谁曰不宜。窃思我圣朝声明文物之邦，尊师重傅天下皆然，何物洋奴而竟为此人头畜鸣之事哉？<sup>①</sup>

上引两封读者来函对香山人有很大污辱，这可能是流寓上海的广东侨民对事业成功的香山人特别是香山籍买办妒忌所致。

在19世纪中叶香山人被看作为“买办”的同义词。<sup>②</sup> 根据郝延平、汪敬虞、聂宝璋及刘广京等的研究，早期买办商人绝大多数是广东人。<sup>③</sup> 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王韬记载，上海的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sup>④</sup> 更明确的说法应是香山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中国沿岸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所指“广州化的上海”（The Cantonization of Shanghai）的主角就是曾任买办的香山翠微村人吴健彰。<sup>⑤</sup> 吴氏早年到澳门以贩卖为业，后到广州波斯洋行当仆役，深得洋行大班信任。该洋行贩卖烟土和名贵皮革，吴氏曾经因机智而发了大财。他后来从买办转业为官，他因通晓英语而被任命为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

① 《申报》1874年1月19日。

② 李燕编：《买办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又参考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编：《买办与近代中国》（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

③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收入《清华学报》（台北），1961年6月；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7—420页；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4—180页；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8页。又参考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11页。

⑤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93—409. 感谢何汉威兄提供上述资料。



兼江海关监督。<sup>①</sup> 太平军小刀会事件时被参，说他参加外国人的商业投机。<sup>②</sup> 撤职后他挟巨资回里，广置庄园田宅。但被香山县地方政府参劾，终于破产。上引第二函中所列举各点皆可用来刻画吴健彰的行为。

买办在当时确是一不吃香的事业。香山人容闳曾被宝顺洋行（Dent & Co.）经理赏识而委任为日本长崎分公司之买办，容闳婉辞不就此职。他对该经理的解释正反映买办在时人的评价。容闳谓：“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于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人虽有时困于经济，不得不屈就贱役，为稻粱谋，第予之贫乏尚未至此。设君果任予以事者，则予甚愿为公司代表，至内地一行。如是则予不至以金钱之故而牺牲尊贵之身份。予苟得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无论或给常薪，或给用费，似较任奴隶首领为佳也。”<sup>③</sup>

然而，也有不少香山买办是为时人所器重的。著名香山买办有北岭的徐润、唐家湾的唐景星、濠头的郑观应、前山的刘世吉及掌管太古洋行六十年的三代华人买办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莫应淮祖孙，<sup>④</sup> 他们不单从事买办工作，并投资于鸦片、丝茶贸易、股票、房地产及近代新式企业。在香港、上海进行大量商业活动。

唐景星和徐润在1874年初正受李鸿章委任为中国第一间新式公司——轮船招商局的总、会办，他们在上海是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他们与《申报》有业务往来，因此《申报》在论香山人与杨月楼一案时，有一段为香山人的

① 李大节：《吴健彰其人》，《珠海文史》（珠海：1984年），第54—56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03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41—42页。《重修香山县志》，卷22，第87页，收入《文献》第6册，第1957页中也有对买办贱业的描述。

④ 莫氏家族的买办事业，可参看麦国良：《掌管太古洋行六十年的三代华人买办——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莫应淮祖孙》，《中山文史》第20辑（1990年），第67—72页；莫应淮：《英商太古洋行广州分行》，收入《广州的洋行与租界》（《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1—90页。

辩白：

所谓细崽者，此跟班类耳。香山小民从业于此，亦谋生一路，即如他处人亦均有之，如买办者，此生意人×耳。西方既来他方贸易，该方规矩皆不能悉，故赖本地人引导，而华人方从事于是也，即细崽亦不可谓之洋奴，何况买办乎。盖西人之奴，必卖身之人，而后有此称也。西人既赖中人为事，犹之华人亦有待洋人作事，如海关炮局是也。此类洋人，岂可亦谓为贱役乎？夫西人通商之事，于国计为大事。而上海（一）处（则）更甚，无之，而此处为一区区小渔乡也。香山人奏效于此役也，功莫大焉，亦非上海诸人所宜责也。夫人类各有分，如士农工贾是也。欲较量其上下，则以其所行所为之大小，仔细而求之，乃商人之数，更为大矣。吾不知有何貽笑士人之处也。士人有高有低，以其所行所为，尚有如不如商人者，若商人原而谅之可也。然香山人自为商贾者，已属多处，即如中国四方茶叶生意大宗，皆香山商人操之，乃有一小县之人，能兴理此大业，而遂敝之，其可乎？吾故谓天下各县之人，若能如香山人大奏功效，实中国之大幸矣。即或嘉之过分，不亦可乎。然闻有人被轻，则稍过分以慰之，似亦无妨。况香山人大有功于通商之事者乎。<sup>①</sup>

除买办之外，香山地区又盛产赌商。根据近人研究，香山有很多著名赌商。例如何汉威和 Carl Smith 所研究的承办粤省第三届韦姓的宏丰公司之大股东“刘学询、刘渭川、韦玉、韦菘”均是香山县前山人，且有买办经验。刘渭川家族在 19 世纪 80 年代曾担任沙逊洋行买办，到过加拿大温哥华学习海事商业，后担任汇丰银行买办。韦玉、韦菘的父亲是有利银行买办，他们投资香港地产，并任汇丰银行及大东电报局买办。<sup>②</sup>

上述赌商虽用“公司”名义认饷承赌，但经营赌业的风险性是十分巨大

<sup>①</sup> 《申报》1874 年 1 月 21 日。

<sup>②</sup> Carl Smith,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何汉威：《清末广东的赌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1 分（台北：1996 年），第 72—74 页。



的。广东政府也严厉推行禁赌政策，所以赌商常被视为不法商人。<sup>①</sup>此外，香山地区赌博很盛行，《香山县志》载有：“奸民重利，放债引诱富家子弟赌荡号日，引子账文。”<sup>②</sup>赌风对香山人的投机性格似有影响。

香山地区也盛产革命领袖。1853年上海小刀会革命军的首领是香山县人刘丽川。<sup>③</sup>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其支持者也有很多来自香山县。早期兴中会126位成员中有56%来自檀香山香山籍人士。<sup>④</sup>流寓澳大利亚的香山人也对革命有很大财力支持。<sup>⑤</sup>革命式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然而投身革命也会遇到“家属也遭到凌迟酷刑的风险”。<sup>⑥</sup>香山人的革命精神也可旁证其族人的冒险传统。

香山县妇女亦有冒险精神。在清道光年间当地的“自梳女”到上海、广州及香港官绅商贾之家当主厨、奶妈等女佣工作。在20世纪初香山姑婆（自梳女）开始出国打工。香山县古镇、曹步、海州等乡村妇女前往吉隆坡、新加坡、雅加达、西贡、曼谷、清迈、金边等地当女佣工者逾千人，<sup>⑦</sup>当时有人赋诗为赞：

采桑育蚕女，豪气赛男丁。  
漂洋过海去，矢志振家声。  
勤俭为后辈，碌碌逾半生。  
胸怀桑梓事，堪称俊精英。<sup>⑧</sup>

曹步等村落虽因为贫苦而有自梳女出洋，但她们的行为可说是开风气之

① 何汉威：《清末广东的赌商》，第65—67页。

② 《香山县志续编》，卷10，第2页，《宦绩》，收入《文献》，第7册，第2354页。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2—63页，《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④ 汤熙勇：《夏威夷华侨对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反应（1894—1911）》（未刊稿），第7页。

⑤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178—180页。此外澳大利亚香山籍华侨对二次革命有很多捐款，见李承基：《第二故乡》（自印，1997年），照片部分。

⑥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45页。

⑦ 李逵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中山文史》第26辑（1993年），第12、22页。

⑧ 李逵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第23页。

先，具有冒险传统。

#### 四、经济活动中的经营手法

在近代香山商人群中最早经营大型企业的要算唐景星和徐润。他们对招商局的经营方式可助我们了解部分香山人士的投资行为。由于篇幅所限，本节只就徐润个人的投资取向及唐、徐在 19 世纪 80 年代对上海金利源码头的兴建来作案例。

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上海任宝顺洋行的买办。1852 年徐润十四岁随其四叔徐瑞珩到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后充任该行买办。1873 年他在招商局任会办，与唐景星合力筹集商股，1874 年当中约一半的股本是他及其亲友处所筹集而来的。徐氏并与唐景星等合创仁和水险及济和水火险公司及开平煤矿务局等新式企业。到 19 世纪 80 年代徐润成为上海的首富。郝延平指出，徐润在 1883 年的资产相当于 316000 个中国农民的年收入，他的资产净估相当于 82150 个农民的资产。<sup>①</sup> 表 2 是徐润在 1883 年投资的情况。徐氏本来看准上海地产将来的价值，至 1883 年他共购有上海土地 2900 亩，另拥有盖建房产的土地 320 亩，但由于 1883 年上海金融风潮使他损手烂脚。他后来交出全部地产所有权和股票，用以偿还总额 250 万两的欠债。<sup>②</sup> 他的失败与当时政治动乱中不可预测的风险有关。

<sup>①</sup> Yen - p' 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 - 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72.

<sup>②</sup> Yen - p' 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 - 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272 - 273. 又参考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 期，第 94—102 页。



表2 徐润投资状况 1883年11月

单位：两

资产	房地产	2236940
	股票	426912
	当铺	348571
	应收股票担保账款	397000
	合计	3409423
负债	钱庄贷款	1052500
	股票担保贷款	419920
	房地产担保贷款	720118
	私人贷款	329709
	合计	2522247
资产净值		887176

资料来源：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5、34—35页。转引自郝延平著，陈潮、陈任译：《中国近代商业革命》（1991年），第307页。

招商局在唐景星及徐润时代可说是黄金时代，这与他们大胆的经营手法有关。然而有些投资也相当冒险。金利源码头即是一例。轮船招商局于1877年以银220万两，购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The Shanghai Navigation Company）轮船十八艘及其所有产业。创业不足五年，即拥有轮船三十艘，与英国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雄踞于中国水域之上，鼎足三分，在中国航运史上开拓新的一页。<sup>①</sup>

自归并旗昌后，招商局购置和转租以“地势优越的金利源码头和栈房等产业”，对该局早期经营漕粮客货作出重要贡献。<sup>②</sup>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香山籍的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及会办徐润对金利源码头地基做出大规模投资，“雇工

<sup>①</sup> 参见张后铨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Kwang-Ching Liu,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up>②</sup> “H. B. Morse to Detring”, April 16, 1886; “H. B. Morse to Kleinwachter”, Feb 10, 1887, in Morse Letter Books, pressed copies of Morse’s semiofficial letters to Hart and oth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填滩成地，建造栈房、码头，用银六十余万，勘成地二十一亩五分”，<sup>①</sup> 扩建成招商局的南栈。这些码头栈房当然极有价值，是眼光远大的投资。可惜的是招商局在法租界外金利源码头扩建的地基工程，种下该局与法国轮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The French Mail〉）及三德教堂（Societe des Mission Etrangeres）对金利源新填滩地有业权的纠纷。

金利源无疑是招商局最佳位置的码头。招商局自光绪三年（1877年）在“上海县境小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及法租界自十六铺桥法巡捕房北首起，自置物业三十四亩及租用原旗昌轮船公司辖下的码头，后改称金利源码头。1880年代初期，由于“沙影日涨，不便停泊轮船”，<sup>②</sup> 总办唐景星即请法总领事及会同法工部勘查滩地，“绘验图式，建盖栈房”，并在“新定之线界筑造堤岸，沿堤留空道十三尺宽”，<sup>③</sup> 全部工程共用去资金六十万两，占当时股本额的30%，可说是当时最巨大的工程投资。招商局在建造这一工程之前，曾向法租界之议事会订明：“无论何等主业之权，不能因此准行之情，视之为无有等语。”<sup>④</sup> 此事并在议事会录明存案，招商局存案后，立刻开工填滩，并向中国上海县政府申请存案升科，以防日后有纠纷。

上述新填地基滩地是在上海县境内（不在租界内），最初毗连招商局执业之地计七亩外，亦毗连其他中外业主产业，其中毗连法公司物业的有三亩七分二厘，毗连三德堂的有一亩二分八厘。这二十一亩五分的新填产业在法律上是应归谁所拥有呢？

招商局在光绪八九年向上海县申请对上述新填滩地的拥有权。唐景星代表招商局向上海县申请“升科”，上海县政府即照会英、法、美各总领事，并派员勘丈土地。当时上海县政府认为该地“毗连租界，坐落繁盛之区”，因而要求招商局每亩缴银一千二百两，共计二十一亩多地，招商局计应缴银二万五

①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

③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二，第15页。

④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二，第15页。



千八百两，作为升科的税项。<sup>①</sup>

当招商局要缴付上述升科银钱给上海县政府时，正值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因此唐景星以“敝局无款可筹”为理由，要求上海县政府通融办理，为“免被洋人争执”，招商局请求上海县先行发给升科印照。<sup>②</sup>上海县政府也照办了。当招商局办妥上述升科手续后，法国轮船公司及三德堂神父也向中国政府请求升科。由于上述新填滩地毗连三德堂地，该堂神父即以兴建栈房与善堂有碍为理由，要求招商局停工待商。不料该神父于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自行起造栈房，出租他人，并向上海县政府提出申请登记上述土地的拥有权，要求交付升科银，完成正式对该地拥有权之依据。

当时正值中法交恶，上海形势紧张，加上招商局与法国轮船公司的租约刚满，唐廷枢为保存在新填滩地上的投资，应允每年以一万九千两的高价来承租该地段，中法战争期间，招商局所有产业由旗昌洋行接管，战后这块地产物业再成为中法商务交涉的焦点。

三德堂及法国公司方面以“商局填岸造栈，其滩内店街地半向法公司、教堂租用”。三德堂及法国轮船公司又以“子母相生之例”为由，一方面以教堂与招商局租期已满，催招商局交还土地及填岸，并向中国政府申请升科。<sup>③</sup>三德堂及法国公司请求法国领事相助。法国领事多次以“租界无论何国，商地皆系母生子……以便毗连地主”为理由来支持法方的要求。法领事并强调“前由商局私囑道县于滩归局为业主与沪口通例不合，县契应作废纸，当与法商另议租购坟滩。否则毗连老地，亦不肯承租。”<sup>④</sup>法国方面是十分强硬的。这一案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招商局每年交纳一万九千两来租用新填滩地与母地业主。最后法国政府提出用十万两来赔补中法战争后法国发行占用招商局在海防及安南的产业；并同意招商局以十五万两向法方购回金利源地段新填地基的

①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一，第11页。

②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一，第12页。

③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一，第13页。

④ 招商局档案，468，卷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五，第1页。

土地拥有权。<sup>①</sup> 这宗持续近十年的地基纠纷得以解决。

本节试图透过招商局在 19 世纪 80 年代金利源新填地基的纠纷，来考察香山籍招商局总会办投资金利源码头的风险性。过去学者多从正面来肯定唐廷枢、徐润在金利源地基上的投资策略，他们对金利源地段的投资是具有商业眼光的。然而上述投资对招商局在 1883 年金融风潮时资金流通增加压力，而且因为毗连法国产业，在中法战争法国获胜的情形下，唐廷枢、徐润的投资策略，并未如原来的推算，可以有利无弊。但是招商局虽被迫向法方交租金，而仍保有金利源码头栈房的使用权，对局务有利。这一个案例表明唐、徐等香山商人投资眼光敏锐，有胆量以大笔资金为填滩地之用。这也就像徐润以大量资金在上海购地建屋，没想到 1883 年金融风潮之猛烈，结果玉石俱焚了。虽然唐、徐在上海的投资活动大体上终归失败，他们在商业上的进取精神毕竟是可钦佩的。

## 五、移民模式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地濒海洋，是中外接触的重要通道，该地人民富有冒险精神，远涉重洋致富的例子很多。早在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香山县海商吴添进就已通番。<sup>②</sup> 1800 年，程世帝、鲍志、鲍华、郑某等十多个香山县侨民乘坐两艘帆船经过月余的航程，抵达槟榔屿，其后有香山侨民陈某于 1802 年在槟城建立“香邑公司”，成为香山侨民在东南亚地区最早建立的同乡会馆。<sup>③</sup> 近百年来，香山各乡的村民除在港、澳外，很早就移民海外，

<sup>①</sup> 招商局档案，468，卷 328，《光绪三年购置金利源码头地基纠纷》，五，第 1 页。

<sup>②</sup>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香山》，转引自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的形成及其经营方式》，载广东省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会编：《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28 页。

<sup>③</sup> 马来西亚中山会馆联合会：《首届国际中山会馆恳亲会纪念特刊》（1996 年 9 月 14 日及 15 日），第 49 页；又参考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东南亚研究所出版，1980 年）；高民川：《中山市华侨大事记》，《中山文史》第 20 辑（1990 年 12 月 20 日），第 8 页。



到新加坡、檀香山、三藩市、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古巴、日本、新西兰、千里达、澳大利亚等六十多个地区发展，经过多年拓殖，产生很多著名侨商。他们有的在侨居地成为首富，并组织同乡会社。有些侨民回到中国投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sup>①</sup>

香山地区的侨民除了早期乘坐帆船到东南亚地区之外，有不少被“卖猪仔”到海外。有些可能是受骗而被“带进猪仔馆”，<sup>②</sup>但很多到美国及澳大利亚的侨民是甘冒风险，自愿到海外创业。<sup>③</sup>他们不是猪仔或苦力（coolie），但他们大多和中国移民头目签订契约，在三至五年内以无偿工作来赎身。

猪仔的命运最悲惨。在出洋前被关进猪仔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记载：“当1855年余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住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以今思之，犹为酸鼻。”<sup>④</sup>这种非人生活，真可以用“浮动地狱”（Float Hell）来形容。<sup>⑤</sup>为工头在异乡工作者，生活亦极艰苦。兹就澳大利亚香山籍侨民模式来讨论其冒险创业精神。

第一代到澳大利亚垦荒的香山人多以“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的方式来到澳大利亚。香山县曹边乡的梁坤和（1833—1908）到澳大利亚谋生的经历是一典型例子。1849年8月他年仅十六岁，因家境清贫和丧失了双亲，以冒险精神自愿到澳大利亚掘金，抱着发财的希望。他的命运比较好，到岸后先到昆士兰州罗便臣的农场做三年合约劳工，其后与同乡友人一起到维多利亚州（朋地谷）（Bendigo）掘金。他们常受辫发被人抓之辱，甚至被土著及白人伤

<sup>①</sup> 黎志刚：《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第七届中国海洋发展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5月1—3日）。

<sup>②</sup>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08页，《香山县人李阿达供》。

<sup>③</sup> June Mei, “Socioeconomic Origins of Emigration: Guangdong to California, 1850 to 1882,” in Lucie Cheng & Edna Bonacich eds.,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20.

<sup>④</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8页。

<sup>⑤</sup> 李承基：《第二故乡》，第3—4页。

害。在澳大利亚艰苦创业时历尽风险，有时“黄金梦、梦成空”。<sup>①</sup>

从淘金时代开始，各地都有排华暴动，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都有反华联盟（Anti-Chinese League）之类的组织。从186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相继制定排华法案。在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立法例不准华人领取采金执照，使许多中国侨民转业。

梁坤和离开朋地谷金矿区后，在1858年决定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汤士威卢（Townsville）近郊处定居，集合一班香山同乡四百至五百人在昆士兰州垦殖玉蜀黍、马铃薯等，并移植香蕉；所出产的香蕉品质优良而畅销昆士兰各地。<sup>②</sup>与一般华侨移民模式相似，第一代香山侨民先到侨居地创业，站稳阵脚后，会像滚雪球一般，把家族、宗族、邻里带到侨居地发展。梁氏在事业成功后，对同村和同县的香山人十分照顾，使第二代香山移民有一可靠的谋生桥梁。他们的运气比第一代好。

第二代澳大利亚香山商人以马应彪（1860—1944）和郭乐（1874—1956）之成就最为可观。马应彪是香山县环城区沙涌乡人。他的父亲马在明以“契约劳工”方式到澳大利亚淘金，但并未致富。马应彪在二十岁时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后转营菜业。马氏于1890年先后开设永生、永泰、生泰果栏。郭乐是香山县环城区竹秀园村人。1892年郭乐离开家乡远赴澳大利亚雪梨，在菜园当雇工。郭乐的长兄郭炳辉在墨尔本当帮工，虽不能对郭乐有直接的照顾，但也起了桥梁作用。五年后，雪梨有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因经营不善，有意出让。郭乐于1897年8日与同乡欧阳庆民、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合资澳币1400镑承办永安果栏。初创时，永安果栏只是售卖蔬菜和生果的摊位，并兼营一些中国的土特产及杂货。这些经验对永安百货业日后的发展颇有帮助。

由于采购上需要，郭乐到盛产香蕉的斐济（Fiji）岛拓展业务，并在昆士兰州及新南威尔斯州北部的Coffs Harbour经营水果贸易，生意蒸蒸日上。1902年与沙溪乡马应彪所开办的永生、永泰果栏合并，在斐济首府瓦埠（Suva）建立“生安泰”果栏，由郭乐的弟弟郭泉主理。“生安泰”的店名中“生”代表

① 李承基：《第二故乡》，第21页。

② 李承基：《第二故乡》，第46—53页。



“永生果栏”，“安”代表“永安果栏”，“泰”代表“永泰果栏”。当时“生安泰果栏”购入香蕉园 350 英亩，作为种植香蕉的园地，雇用一千多名员工，每月可运二万串香蕉到雪梨，获利甚丰。<sup>①</sup> 上述的昆省富商梁坤和也乐意帮助马应彪和郭乐果栏事业之发展。梁氏把昆士兰香蕉代理权交由“生安泰”代理。这对马氏和郭氏家族以后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马应彪和郭乐等虽然是比较幸运的第二代香山籍澳大利亚移民，他们在白澳（白人的澳大利亚）政策威胁下回到中国。他们所受的各种压力增强了他们事业的创造性。

马应彪于 1894 年在香港开办永昌泰金庄，经营进出口货品。马氏在雪梨时曾注意到 Anthony Hordern & Son 等百货公司以明码实价为原则，经营便利。马氏力倡组织“不二价”的百货公司，以改变香港商场的积习。马氏等对澳大利亚地区的百货业十分留心，他以雪梨的 Anthony Hordern & Son 为模式。1900 年，马应彪、马焕彪、蔡兴、郭标、马永灿和黄焕南等集资 2.5 万港元，由马应彪司理，创办先施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172 号购置一幢三层店铺，大加装饰，又从乡间招来男女二十五人，训练他们待客有礼。由于业务蒸蒸日上，1907 年向香港政府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sup>②</sup> 他们的手法具有冒险性和开创性。首先他们提出“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的口号，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做法。

---

① Wellington K. K. Chan, “The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of the Wing On Company group in Australia, Fiji, Hong Kong and Shanghai: organisation and strategy of a new enterprise,” in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80–95; Wellington K. K. Chan,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0 (Summer 1996), 141–166; Wellington K. K. Chan,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ing and the Pacific Rim: The Family Firm’s Role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1 (Summer 1992), 171–190; Yen Ching – Hwang, “The Wing On Company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1907–1949,”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in Eighty years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IV (Taipei 1991), 77–117; 孔令仁：《郭乐、郭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62–263。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48—250 页。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点出马氏经营的观点，“盖营业之道，首贵于诚实，倘未能以诚实实施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又以先施二字，英文为 Sincere 亦有诚实之意，音义相同，故本此宗旨，首创不二价。”<sup>①</sup>先施公司之营业创新尚有：店铺星期日休息，购物必发收据和雇用女售货员来售卖商品。当时有人说这是过于标新立异的做法。部分股东并以雇用女工和星期日休息为口实，要求清盘结业。但上述的经营方法使先施公司获利甚丰。先施在香港成功的基础上，在 20 世纪初先后在广州、上海、新加坡及南宁等地开设分店，还在伦敦设办庄，兼兴办保险、银业、化妆品等业务。

在侨寓外地的香山人中，澳大利亚地区的侨商成就似最为彪炳，自 1842 年至 1949 年海外华侨在中国的投资以东南亚及澳大利亚华侨为最多。根据林金枝的研究，澳大利亚华侨在上海的总投资额占 30.05%，当中绝大部分是香山人的投资。<sup>②</sup>从百货业来说，20 世纪初年港、穗、沪均有“四大公司”。香港的四大公司是指上述马应彪在 1900 年创立的“先施”；蔡兴、蔡昌所创办的“大新”；郭乐、郭泉（1879—1966）所开办的“永安”及陈少霞创办的“中华”。广州的四大百货公司是指上述香港的“永安”、“大新”，及 1910 年黄在扬、黄在朝所创立的“真光”及“光商”。上海的四大公司是指“先施”、“永安”、“大新”和刘锡基及李敏周所创办的上海“新新”百货公司。<sup>③</sup>这些公司创办旅馆、舞厅、酒楼、娱乐场所、保险公司、银行及其他企业。比较大规模的企业还有郭乐及郭顺等在 1921 年 6 月集资 600 万港元创设的永安纺织公司。他们的事业在中国开花结果。

总括而言，香山地区的移民在外饱受各项挑战，冒险奋斗中建立其灵活的适应性。他们在外地接触新鲜事物，开阔的视野有利他们在中国创业。在外的痛苦经验往往转化成开创新天地的本钱，对他们的事业有不少帮助。一旦他们

<sup>①</sup>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第 248—250 页。又见《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00—1924 年）。

<sup>②</sup>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上海篇》（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

<sup>③</sup> 麦国良：《香山籍人创办的四大公司》，《中山文史》第 17 辑（1989 年 11 月 12 日）。



找到正常、稳定的创业机会，他们就会善于利用这些机会。

## 六、近代香山商人减低风险的经验

香山商人在外经商有时“所托非人”，财产被人侵占殆尽。加上境内“海盜横行、劫船掳人，而倾家荡产”的例子很多。<sup>①</sup> 这些风险有助于香山籍的企业家思考降低风险的方法。由于篇幅所限，本节只简略讨论人事网络的形成和保险制度的建立。

人事安排方面，我们可看出一个现象：香山人的企业中股东和中级以上的行政人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香山地区的人，其中不少为创办人同村的族人。在永安纱厂及其他香山商人办的企业中，分公司的主管也来自香山地区。基层的员工则来自厂店所在地。<sup>②</sup> 这种人事网络在香山商人办的企业中非常普遍。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式管理与血缘及地缘有很大关联，香山地区商人也不例外。他们往往在商业活动中借重亲族，特别是兄弟、伯叔、子侄、同宗、同姓和左邻右里，互相提携、互相扶掖。这种亲族情怀、乡情互助的方式，不单源于个人感情关系，亦建基于减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考虑，<sup>③</sup> 同宗同姓的血缘关系是可以信赖的。企业家创办企业时，首先会安排其兄弟及子侄在企业中担任基本干部，亲族也在资本融通上给创办者有力支持。例如，轮船招商局早期集资过程中，唐景星、徐润及郑观应的很多亲友成为招商局的股东和商董。永安公司的创办人郭乐在永安果栏生意兴旺时，把其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从家乡竹秀园村接到雪梨来襄助他的业务。<sup>④</sup> 永安集团的员工也多来自香山县竹秀园乡。当新新公司创办时，李敏周“正在上海春风得意，事业鼎盛之际，希望自己嫡系子侄同来发展”。他亲自回到家乡石岐

<sup>①</sup> 林天子编：《广东中山县泥湾乡林氏家谱》（自印，1978年叙），第61及141页。

<sup>②</sup> 李承基先生面谈记录（一），1997年3月27日，及中研院藏《经济部卷宗》中有60至70个有关中山商人的档案。

<sup>③</sup> Robert A. Pollark,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3 (June 1985), 583.

<sup>④</sup> 孔令仁：《郭乐、郭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第262—263页。

召集其子侄李道生、李道谦、李道成到上海。他并用其侄儿李若陶为新新公司的主要经理人。<sup>①</sup>他年幼的儿子李承基也列在股东名单之内。这种人事安排有保险的作用。

在商场中，网络是创造资本的泉源。有人说：网络即资本（Network as Capital）。<sup>②</sup>香山人对商业网络十分重视，香山商人也热心社会公益，以及同乡会的活动。唐景星和徐润是广肇公所的创办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主管在广肇公所、广肇公学、广肇医院、广东公学、广东同乡会、粤商俱乐部以及岭南大学等处都有捐助。香港的香山商人对保良局及东华三院均极力支助。他们对香山地区的社会事务及教育均有赞助。他们也结交政界人物，以增强其社会声望和文化表征的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些社会关系有时会达到“路路通”的效果。

除上述百货公司等业之外，香山人对保险业务也特别注重。招商局创办时常有海难发生，早期的“福星号”事件即为一例。保险业务是在经营航运业中所遇到的课题。在外国保险公司不愿全保招商局局轮时，唐、徐等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一日（1875年12月28日）创办保险招商局，其业务均依照洋商保险公司方法及章程。后来唐、徐更创办仁和水险公司，由招商局经理。该公司对招商局的资金融通和保险贡献甚大。在香山人办的企业中，永安集团和先施集团也特别注意保险公司的设立。这些保险公司本身也有可观的溢利。<sup>③</sup>

总的来说，香山人在其进行冒险活动的同时，特别注意防范风险的措施。他们之注重保险业及重视人事上的安排及网络，多是从其冒险活动中总括而来的需要。这些经验不单有助他们自己业务的扩展，也导致一些新创的商业制度在近代中国出现。

① 李承基：《第二故乡》，第174—175页。

② 感谢叶富强兄的提示。

③ 《香港先施保险置业有限公司第拾五届总结册》（1929年）。有关中国保险业的历史，参看颜鹏飞、李名炆、曹圃：《中国保险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